

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

王润玉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对其消费思想的系统性探讨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尤其是要加强对毛泽东消费思想历史演变逻辑的研究。梳理毛泽东消费思想从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时生存型消费”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配给型消费”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发现其对当代中国消费领域仍存在重要启示: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正确把握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消费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消费;消费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3-0027-08

马克思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①这一论断揭示了消费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宏观经济视角看,消费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消费思想作为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合理消费”“反对浪费”“倡导节约”等理论内核,并通过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经验。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关键历史分野,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消费问题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探索,旨在揭示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历史演进逻辑。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建构中形成了独特的实践路径,为后发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②这一战略部署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毛泽东消费思想中科学方法论的内在理论延续。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极端困境中重构经济伦理与消费秩序的历史智慧。在外部经济封锁与内部生存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传统小农经济体系无法满足革命战争的基本物质需求,也难以承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使命。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消费问题纳入革命动员的总体战略框架,通过生存型消费的理论建构,实现了民生保障与政治动员的辩证统一,其核心要义既体现为发展生产、合理分配、适度消费的实践逻辑,又蕴含着通过消费关系改造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政治哲学。这种消费思想既非简单移植苏联模式,亦非传统均平思想的复归,而是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时经济治理方案。从减租减息政策到消费合作社建设,从生产运动到节约运动,

收稿日期:2025-0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RC009);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KYCX25_0044)

作者简介:王润玉(1997—),女,山东临沂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多维实践,既维系了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又重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伦理,为后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一) 战时经济的特殊语境:经济封锁与生存压力

战争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阶段,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导致根据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陷入困境。在封锁最严苛的时期,连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都难以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生存危机,同时为保证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维持前线军队的生存与作战,必须合理利用有限资源。战时消费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节约成为集中力量满足革命战争物资需求的必然选择,关乎革命的成败与前途。军队日常补给优先于普通民众的非必要消费,民众也通过节省生活物资、参与生产等方式,为满足战争需要这一首要目标贡献力量。

此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困境中。长期的封建经济状态致使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极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地主阶级通过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导致农民生活极度贫困,消费能力极其有限。消费呈现出严重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少数城市富裕阶层消费水平与农村的广大农民之间拉开极大差距,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面对严峻的消费分化,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针对生产和消费问题进行一系列思考并实施具体治理措施,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之,这一时期的消费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二) 战时生存型消费的理论构建

1. 民生保障与革命动员的辩证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的双重维度中,系统建构起民生保障与革命动员的辩证实践逻辑。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批评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关于战时忽视民主民生的想法,并指出如果不能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进攻^①。他强调,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党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密切联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切行动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②。因此,即便是在困难重重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和“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③。例如,陕甘宁边区将1943年上半年盐业公司利润的80%至90%用来增加边区人民收入,以此改善民众生活^④。在政策上既通过直接的物质利益分配让群众获得看得见的实惠,从而激发其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又通过合作社经济等制度设计,将民众利益与革命政权的存续深度绑定,使短期民生改善服务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远目标。这种将民众物质生活改善视为政治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其人民战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具象化展开。

因为毛泽东深刻意识到民主是凝聚人心、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民生是改善人民生活、获取革命胜利的关键,重视民主和民生既是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他人民史观和务实思想的体现,因此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民主和民生问题。质言之,民生保障通过满足群众现实需求为革命动员提供现实动力,而革命斗争通过打破旧秩序为民生根本改善创造制度条件。这种双向互构关系正是我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机制。

2. 强调自力更生,努力发展生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对我党进行“围剿”,也在经济上推行封锁策略,在这种困境下毛泽东要求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合作社,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从而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局面。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要求“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⑤,他论述了军队生产自给的好处,不仅能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④《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0页。

担,扩大军队,还能够促进军民之间的良性互动^①。毛泽东要求干部们充分调动广大群众进行自力更生的积极性,战争年代的消费被分为三个标准:一是前线完全由政府提供,二是边区机关完全自给,三是一些无法百分百自给的地区实行部分自给。

3.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奢侈

毛泽东始终强调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通过节约可以节省一大笔不必要的浪费性支出,坚决抵制贪污腐败、摆空架子等官僚主义作风^②。毛泽东要求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杜绝滥用浪费,但也并非一味通过收缩开支来解决财政困难,他批评了“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这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③。他认为财政方面的困难,不能只通过“节流”来解决,限制消费只会一再降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发展经济,开拓财源的“开源”做法才是根本。

(三)战时生存型消费的实践探索

1.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

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再次强调“要求取消苛捐杂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等具体纲领^④。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为减轻人民负担,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在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推动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就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和高利贷问题,推行减租减息的重要经济政策,包括实行“二五减租”,旧债利率限一分半,新债利率自主协商^⑤,从而缓解农民的经济压力,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分别是减租减息和取消苛捐杂税政策成功实践的典型地区。在减租减息政策实施之前,陕甘宁边区农民普遍受到地主剥削,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减租减息后,农民收入增加,能够购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中布匹、农具、日用品的交易量显著增加,提高了市场的繁荣度。据统计,延安市各种商店从1936年的123家发展到1943年的473家^⑥。晋察冀边区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在政策实施以前,农民不仅要缴纳高额田赋,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负担极其沉重。取消苛捐杂税以后,农民有更多收入用于家庭消费和生产投资。毛泽东领导的减租减息和取消苛捐杂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成功实践。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还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发展生产,创建消费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支持革命斗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发展生产,建立消费合作社的实践探索。在进行这一实践探索的过程中,考虑到农村的人力和物力较为分散,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⑦,从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通过提倡组织劳动互助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鼓励妇女参与生产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推进性别平等运动。发展生产提高了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也为根据地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导向的“保障性消费”模式,本质上是通过控制消费规模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与工业建设。

1933年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在瑞金成立,标志着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形态的诞生。这里的“消费”并非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需求满足,而是依托集体采购和计划配给实现的生存物资供给。中央苏区时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期,消费合作社承担推动苏区经济发展、调节市场供需的关键职责,并有效维护了苏区商品价格的稳定,确保了军民所需物资的供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消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为既是军民日用品的分配渠道,也是中共贯彻“生产决定消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实践载体,使人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烟叶、盐、电池等商品,这种对“消费”的行政化管控,与毛泽东理论上强调的消费服从生产形成呼应,但更凸显战时体制下消费的工具性特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领域实现从战时体制向国家建构范式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新生人民政权的确立和工业化战略的全面推进,毛泽东将消费问题置于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与现代化赶超的双重维度中重新阐释,形成了以计划配给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消费思想体系。这种思想转型既源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所衍生的结构性矛盾——在生产资本极度稀缺的约束条件下,国家必须通过消费节制实现超常规积累,同时也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流程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构建起以积累优先、适度消费为原则的理论框架:在产业结构层面确立重工业导向的消费约束机制,在分配领域运用统购统销政策重构城乡交换关系,在消费环节通过票证制度实现社会产品的计划配给。这种消费模式既是对苏联计划经济经验的批判性借鉴,更蕴含着通过消费管制重塑经济秩序、培育集体主义伦理的政治考量。从统购统销到定量供应,计划配给型消费思想在实践中既推动了独立工业体系的快速构建,也暴露出积累与消费的深层张力,其间的理论创新与经验教训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思想坐标。

(一) 工业化优先的战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在此之前,中国经历的长期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工业几乎停止、农业受损严重,物资匮乏全面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面临着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必须从零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重积累、轻消费”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走上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计划调控资源分配和生产活动。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设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有计划地组织和调控重大经济活动,从而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方向,确保经济朝着既定目标有序发展。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将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粮食、布匹、日用品等基本民众消费品供应不足。在那个商品供应极度匮乏的年代,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也受到计划的约束,国家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油票、煤票、肉票等专用购买凭证,对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没有票证,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商品。这种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票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由于商品种类有限,消费选择极少,使民众的消费模式高度同质化。节俭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奢侈消费被视为浪费和不道德,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距较小,抑制了个性化消费和消费升级的可能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消费领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物资供给的普遍短缺、配给制度的广泛实施以及消费水平的整体偏低。在这一体制下,民众的消费需求被严格限定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范围内,消费选择的多样性受到极大限制。消费文化的内核聚焦于节俭理念以及平均主义倾向,这种消费文化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连。这种消费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互适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独特的经济社会景观。

(二) 计划配给型消费的理论体系

1. 产业结构优先序:重工业导向的消费约束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逻辑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工业化基础,同时兼顾农业和轻工业,通过保障人民基本消费需求实现工业化的可持续推进。他承认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模式的核心经验,也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但其理论突破在于尖锐批判了

苏联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追求重工业增速的畸形发展观。当毛泽东了解到从1925年至1957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93倍,而消费资料生产仅增长了17.5倍以后,他认为这种模式虽短期内可快速积累工业基础,却因压制民众物质利益而削弱生产积极性,最终阻碍重工业的可持续发展^①。他指出如果“真想”发展重工业,需要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保障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巩固重工业的基础^②。这一逻辑突破了苏联将重工业与消费对立起来的做法,只有在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基础上才能反过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目标与人民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2. 人民需要和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思考了人民需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们生活需要的增长会刺激生产不断发展,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创造新的需要^③。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是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生产并非单纯追求产量的增长,但受限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等历史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仍需要采取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这也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水平的快速提高。而生产力是满足需要的物质基础,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后,生产本身会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刺激和塑造了人们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毛泽东看到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满足需要,而且还创造着新的需要。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分配生产成果。因此毛泽东讲:“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④即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时,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有效响应人们对新产品、新服务的需要。

3.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

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⑤。他要求即便取得革命胜利后也要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奋斗精神,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倾向,崇尚朴素生活,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问题》中讲道:“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⑥有了积累,国家就富裕起来了。在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倡导通过低消费、高积累的方式,来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薄弱的经济基础,朴素节俭成为社会风尚。此外,他还批判了传统伦理风俗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⑦。他在各个方面都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

(三) 计划配给型消费的实践探索

1. 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

1953年,毛泽东借鉴了苏联曾实行的“余粮征集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决定启动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并于当年10月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国家以固定价格收购农民余粮,农民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自由存储、使用、交易,即计划收购;其次,对城市居民和工业用粮实行定量配给,按人头发放粮票,即计划供应;最后,粮食购销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管理,私营粮商被逐步取缔^⑧。此后,统购统销政策逐渐拓展到其他农产品中,随着1956年农村合作化完成后,统购统销与集体经济结合,农民必须按国家指标交售农产品。

统购统销政策为新中国初期的社会稳定和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导致了农业长期滞后和消费市场僵化。统购统销政策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粮食问题,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出现。通过低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人民日报》1954年3月1日。

价收购农产品,国家借助“剪刀差”政策获得工业建设资金,有效遏制了企图投机倒把的私营商业,控制了关键物资的流通。但同时,由于统购价格偏低,部分农民被迫交出大部分余粮,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另外,长期定量供应导致消费品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2.票证制度与定量供应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后,国家控制了主要农产品的流通,但如何公平分配成为问题。毛泽东本人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应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需要^①。由于他认为自由市场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为应对物资短缺、保障基本民生,并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我国推行票证制度和定量供应的物质分配政策,以限制私人交易,巩固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②。这体现了毛泽东对有限资源进行计划分配的哲学基础。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在1966年正式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要求压缩消费、储备物资,票证制度成为战备经济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由于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和军事准备,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延缓了民生改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残留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和等级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加以限制。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久而久之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为了缩小人民群众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毛泽东主张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结果走向了平均主义,反对用金钱激励生产,强调“政治挂帅”。

票证制度与定量供应在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工业化和保障基本生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民众生活水平停滞,消费长期受到压抑,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粮食仍低于1957年。僵化的分配导致“有票无货”“排队经济”,城乡差距也逐渐拉大。

三、毛泽东消费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语境下,消费作为连接生产与分配的关键环节,其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亟待价值重审。2025年3月16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出台,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实践表达,更是对毛泽东消费思想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毛泽东关于积累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范式呈现出新的时代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消费思想通过构建“国家—集体—个人”三维利益共同体框架,确立了社会总产品分配机制的社会主义属性。其核心要义体现在:第一,将群众物质利益原则上升为执政伦理,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③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政治承诺;第二,运用“两点论”破解发展悖论,既反对牺牲民生福祉的“高积累陷阱”,也警惕透支发展潜力的“超前消费倾向”;第三,通过“统筹兼顾”方法论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动态平衡,既要发展生产巩固国家经济基础,又要通过分配调整保障人民生活。这些理论遗产为破解新时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④提供了历史镜鉴。

当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将毛泽东消费思想创造性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治理实践。一方面,要构建积累—消费更高水平的平衡,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这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和慈善机制,实现社会财富的帕累托改进,从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并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10/content5659796.htm>。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的经济建设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消费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发展同步,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此外,过度强调积累会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过度消费则会影响长期发展,要在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合理确定积累率,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优化供给创造需求,破解消费制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驱动型现代化道路。

(二)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避免奢靡之风

在消费社会与数字经济交织的新历史方位中,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正经历着当代价值的重构。这种重构并非简单的道德训诫复归,而是对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消费异化”的实践性回应,其本质在于构建新发展阶段的消费伦理范式。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具有三重现代性转化向度:其一,作为破解物质丰裕和精神匮乏悖论的实践哲学,将革命年代的低消费、高积累的模式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创新性节制;其二,作为抵御消费主义侵蚀的文化装置,通过激活传统文化中“俭以养德”的伦理基因,形成对抗物欲膨胀的精神抗体;其三,作为矫正社会加速异化的治理工具,其“反奢倡俭”主张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全面节约战略”^①形成历史性共振。即使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避免奢侈之风的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并非要求人们过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而是告别节衣缩食的刻板印象,转向创新奋斗、智慧节约的新形态,本质上是找寻物质丰裕时代的精神定力。

当前中国面临“未富先奢”和“消费降级”并存的复杂图景: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比上年增长5.7%(2020—2023),居民年均消费水平比上年增长9.13%(2020—2023)^②,说明我国居民消费质量提升滞后于数量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2024年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汽车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2023年呈负增长^③,表明我国消费者有意缩减非必需高端消费。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效能:通过建立物质消费和精神成长的均衡模式,将消费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系统;借助“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将节约资源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动能储备;依托数字化治理手段,构建绿色消费指数等新型监测体系。要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文化,必须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以艰苦奋斗精神和反对奢靡之风为核心的精神防线。如何在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基础上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成为焦点问题,要在弘扬艰苦奋斗和反对奢靡作风的基础上,回归人的本质需求,从而找到破除现代性困境的精神解药。

(三) 正确看待消费的积极作用

在毛泽东生活的年代,由于长期战争环境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经济政策始终将扩大生产置于优先地位,消费问题主要被纳入保障基本民生和维护社会再生产的范畴进行考量。从毛泽东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重视群众切身需求,但在实践层面,消费始终服从于工业体系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分析生产力和其他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范畴并非永恒不变^④,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等范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存在必要性,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其具体形态将发生变革。这种认识投射到消费领域,表现为既肯定消费对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用,又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将消费需求严格纳入国家调控范畴。从历史视角看,毛泽东时代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索,为理解当前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经验参照,但需清醒认识二者本质差异——前者是短缺经济下的生存型消费管控,后者是过剩经济中的发展型需求激活。这种对比恰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历史局限性的超越。

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的前途、远景,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③《2024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501/t20250117_1958327.html。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位^①,引导人们心怀共产主义远大而恢宏的目标,激励人们不断奋斗。应注意的是,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在追求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同样要认识到人们的幸福应当落脚到当下的追求,正当的享受是人们幸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要正确看待消费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消费的积极作用呈现三维理论图景:首先,消费作为拉动内需、促进生产循环的不竭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充当技术革命的需求驱动器,消费增长带动科技与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进一步稳定就业市场。最后,消费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各种需求。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演进,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型,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当前政策创新分别从制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系统激活消费的治理效能,这种多维度创新实践,一定程度上是将毛泽东消费思想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消费提供实践范本。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Mao Zedong's Consumption Thought

WANG Runy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Mao Zedong's economic thought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his consumption thought, especiall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of Mao Zedong's consumption thought. This paper comb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s consumption thought from "wartime survival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to "planned rationing consump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finds that it still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umption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fundamental position, correctly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strong spiritual strength of hard struggl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of diligence and thrif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consump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thought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